

从“江豚之死”到食品药品监管

三川原声

□王绍桢

洞庭湖“江豚之死”引起了媒体的关注。据专家推测,其死亡原因可能有三:一是遭到传染性疾病侵袭,二是中毒,三是饿死。WWF 的调查报告还表明,据不完全统计,由于捕捞作业误伤导致死亡的豚类占死亡总数的近一半,江豚身体上常见螺旋

桨留下的痕迹。工业排放等造成的水质污染,也给江豚的生存雪上加霜。显而易见,江豚之死与生存环境遭到破坏密不可分,人类作为强势群体在有意无意间对江豚实施“杀戮”。

江豚与人类同为自然界的动物,却有低级与高级之分,除生存方式与生存环境不同外,其共同点压根不容置疑——都有一个“生老病死”的过程,生命的延续都要靠食物赖以维持。人类因食物而中毒,尚能通过现代科学医疗化险为夷。然而,可怜江豚因食物而中毒只能一命呜呼!这“活该”是江豚的悲哀?

江豚之死无疑与其生存空间被挤压不无关系,利益驱动下的人们对江豚缺乏太多的“关爱”,这已是不争的事实。其实,人类又何尝精心关爱呵护自己的同类呢?就日前发生在云南省的学生因营养餐大面积食物中毒便是典型一例;而几乎与此同时经媒体披露的工业明胶生产药用胶囊的惊世案例,足以说明不法商人为追求暴利,视公众的生命健康为“儿戏”,人性丧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,天理国法在这些人的眼中已荡然无存。如此,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怎不令人不寒而栗,毛骨悚然。

食品药品安全给人类敲响了警钟。无论如何也不该忘记的是,三鹿奶粉中的三聚氰胺致使千名襁褓中的婴儿弭患肾结石。“瘦肉精”、“苏丹红”、“地沟油”、“有色馒头”等也不同程度的吞噬着公众的健康。食品药品出了问题,恰似一种病毒在社会中蔓延,不但引起了人们的恐慌,破坏了人们的安全感,而且还降低了大家对政府的信任感,使幸福感大打折扣。构建和谐社会怎能缺失这些极为重要的因子,难道不该引起我们的深层次反思?

就消费者而言,绝大部分人对食

品药品并无多少专业知识,消费过程中的安全只能靠政府的质检、药监和工商管理部门来把关。遗憾的是这些本该严格“守卫”的关键节点一而再,再而三的出现漏洞,不能不让公众质疑监管为何屡屡缺失。

说到底,食品药品的安全还要托付给政府,公众的高质量生存要靠那些清洁、卫生、营养丰富、搭配齐全、便于吸收的良好食品来保障。用于维护公众健康的药品不该再去损害公众的健康,希望有关部门在防患于未然上多下功夫。

画中有话

□文/小强 图/春鸣

日前,网曝洛阳市洛宁县环保局领导,周末开公车带家人去野炊。网帖引网友围观。该县环保局随即回复称“局领导驾车现场检查水质监测情况”,遭到更多网友质疑,环保局监测水质需要带家小吗?据洛宁县县委办的回复,这名领导此举构成违纪已被处分。

监测水质是一件很科学的事,取样、化验、比较、评估,都必须严肃认真,而领导却是一个浪漫主义者,要把整个过程变得充满了趣味,撒满妇女儿童的笑脸,于是叫上老婆孩子做义务监测员。为了监测水体的生态,摸鱼儿,为了监测鱼儿是否受了污染,一家大小架起锅拾来柴,弄熟了亲口尝……为了环保事业,瞧这一家子的忙乎劲!说我公车私用,我就说私人公用,不但没错,还显得高风亮节。

若是这样,公安局的开公车带家人去玩,可以说是检查治安情况,工商局的可以说检查市场秩序,卫生局的可以说检查食品安全……所谓的公车私用,那还查个P呀!



百姓观点

听说豪宅悄悄降价

□林明杰

我不太关心房地产市场,因为没有必要关心买不起的东西。就像所有没有勇气期盼自己发财的朋友们一样,唯有暗暗期盼房价下降。但最近偶然在微博上看到一些江边豪宅悄悄降价的消息,而且降幅不小,如某楼盘从12万多跌至8万多。但正如一位朋友对我说的:类似豪宅别说打对折,就算打到骨折,还是买不起。

豪宅降价对大多数公众毫无意义,只对富豪有好处,他们可以

用更低的价钱买到豪宅。

只有普通住宅价格降到适合普通公众的消费能力,或者普通公众的收入提升到消费得起普通住宅的价格时,这才有意义。

至于豪宅,我倒希望卖得越贵越好。就像美国金融危机后,房价大跌,唯有类似纽约富人区的豪宅价格依然坚挺。

豪宅卖得贵,富人高消费,并不劳你为他们的钱袋子担心。富人手里的钱更多地流入社会,就会推动市场,推动实业,创造就业;国家也可以从中多收税,用于补贴低收入

入民众的住房。

富人不舍得花钱是祸害。这曾是明朝灭亡诸多原因之一。明朝晚期,资本主义在中国已呈萌芽状,富商们囤积了大量的钱,但小农经济思维使他们不拿出来消费或投资,而是藏在地窖里,甚至熔铸成银山以防盗窃。因此造成了流通没有钱,经济崩溃。

民主法制社会,不应该延续劫富济贫的思维惯性,而应该用经济杠杆变着法儿逗富人多花钱。譬如高附加值的奢侈品等等,让富人们花钱买感觉,公众则从中得实惠。

只要富人的钱来得合法公正,普通公众生活得有尊严,公众是不会“嫉妒”富人奢华的。就像大自然中,有高大的乔木,也有低矮的灌木,只要灌木也有阳光、土壤和水,它不会“嫉妒”乔木长得高。

富人的钱是不难引诱出来的,最难对付的倒是那些贪官的钱。他们不敢花钱(花也不敢在国内花),也不用于投资,藏在最秘密的地方,成为死钱。人民创造的财富因此无法兑现,起不到拉动内需的作用,成为经济流通的黑洞,是潜在的大祸害。

去除补习怪圈的错误诱因

社会热点

□金苍

要打破补习班的怪圈,恐怕不仅需要教育部门的努力,更需要社会管理者进行整体的社会调适,去除集体不理性背后的“错误诱因”。

会考、升学的冲刺阶段,补习班似乎也迎来了春天。有媒体调查发现,有的学生一学期补课费超过10万元,还有一个班一学年单科补课费多达67万元。

一方面,各种名目繁多的补习班使出“量身定制学习方案”、“与出题教师密切合作”等诱人招式,刺激消费需求;另一方面,“拼孩子”的家长在教育投资上缺少指导,往往盲目地一掷千金。可以说,补习市场畸形繁荣,来自供需双方的“合谋”。

更何况,选择补课,也确实有现实考量。一方面,是一些在职教师从事盈利性课外补习获利;另一方面,一些炒到了“天价”的补习班,也有暗藏“漏题通道”的嫌疑。相对于孩子的前途,这样的补课投入无异于“一本万利”。

局外人从“理性经济人”的角度考量天价补习班,往往觉得不可思议:一节课800元,一个月花4万块,值吗?但一旦成为“局内人”,却往往把这“值不值”的追问抛到一边,义无反顾地投身补课大军。原因也很简单:别人都补,自家孩子不补不行。补课的困局,实际上是个体的理性选择造成的群体不理性。

而这种理性与非理性转换的背后,是整个社会的无序竞争。伴随人的解放而来的欲望解放,产生了对于财富、地位的集体焦虑,进而延伸成为一种“教育焦虑”。不久前媒体报道,很多高学历父母走过一条“拼自己”的路后,会自觉地走上一条“拼孩子”的道路。补习中的供需关系,因此成为整个社会中财富、机会、权力等供需关系的缩影。

同时,补习需求旺盛,在某程度上也是缘于正常教育的供给不足。这样的不足,是一种“制度性匮乏”,在应试教育的“分数体制”之下,无论教育者如何努力,也永远都会有低分学生。因此,对提高分数的需求也总是大量存在,课外的补习班于是应运而生。

更何况,整个教育都是围绕分数和考试进行的制度设计。在当前情况下,这确实是确保教育公平的一个底线。但如果一切都围绕考分进行,难免会在社会制造出“考试控”。这就使得以增加考分、应付考试为目的的补习班大行其道,在众多家长“病急乱投医”之时,身价也水涨船高。

“不要输在起跑线上”几乎成为很多人在教育上的基本信条,每个人都希望起跑,导致起跑线也不断前移。面对残酷的社会竞争,要打破补习班的怪圈,恐怕不仅需要教育部门的努力,更需要社会管理者进行整体的社会调适,去除集体不理性背后的“错误诱因”。

□蔡辉

告诉你个好消息,机场建设费取消了,再告诉你个坏消息,要征收民航发展基金了!

近日,围绕机场建设费的改革令人眼花缭乱,在“为规范民航发展基金的征收使用管理,促进民航事业发展”的大名头下,百姓负担丝毫未减。

发展,本是时代的主旋律,可从网上意见看,绝大多数网友对民航发展基金表示不满,令人深思:像这样缺乏民意基础的发展,是否

应更慎重?

问题的核心在于,不论是“机场建设费”,还是“民航发展基金”,皆于法无据。它算税收呢,还是行政事业收费?收费标准的依据是什么,大家能接受吗?既然叫基金,谁来管理,谁来监督,究竟花到哪里去了,掏钱的人能看到账目吗,能参与意见吗?对这些问题不解释、不回答、不沟通,换个名目,就算完成改革了,这怎么能让大家服气呢?

在今年第8期《求是》杂志上,温家宝在《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》一文中提出推进政府预算决算公

开规范化,强调要以公开透明来促进规范管理,遏制腐败行为。中国在发展,收费多在所难免,但应该让老百姓看得懂,让社会更好地去监督。改个名字,左手换右手,云山雾罩依旧,这与时代的大趋势实在太不合拍。

值得警惕的是,在“发展”替代“建设”的背后,改革有被空壳化的风险。明明是要在结构上进行调整,在制度上予以改善,结果却成了文字游戏,长此以往,就会动摇人民对改革的热情,假如改革失去了这一最重要的支柱,那么,部门